

认同与批判: 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

朱发建 张晶萍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得到升华。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各省留学生们均强调本省对全国关系之重,期望本省在民族建国的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他们调查研究本省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以作为自治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热。留学生们一方面认同本省文化、赋予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又对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社会竞争、不符合自治需要的成份进行反思与批判,警醒同胞谋求革新。留学生们通过重新评价赋予了地域文化不同的品格,并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等实际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本省地域文化的形象。

关键词: 清末; 留日学生; 地域意识; 文化形象

中图分类号: K2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605X(2015)03-0027-09

**Identity and Criticism: on the Regional Cultural Viewpoint of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ZHU Fa-jian ZHANG Jing-p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space isolation and the changes of reference frame caused by studying in Japan not only inspired the national spirit of stud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ut also make their regional consciousness sublimat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that one should love and strive for his hometown as the first step of love and strive for his nation, the students all emphasized that their provinces related to nation closely and hoped their provinces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the national movement. As they investigated hometown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culture as the basic of province self-government, a regional culture fan formatted. On one hand, the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approved the regional culture and given it positive value; on the other hand, they reflected and criticized its ingredients which made the regional culture does not adapt the social competition and does not meet the required of self-government, alerting compatriots seek innovation. They gave the regional culture a different character by reassessing its value, and redrawing its image.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students studying in Japan; region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image

中国地域辽阔,地域意识的产生由来已久,在近代尤为盛行,其影响遍及政治、经济、文化等

各个领域,成为引人关注的现象^①。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意识构成了近代地域意识中重要而又独特的组成部分。与国内各个群体相比,留日学生对西方政教文明的感受更深、民族危机意识更强烈,形成了“中国人”的国族认同;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保留了在国内形成的地域意识。正如学者们所观察到的:清末留学生是以省为单位被派遣、并由各省在日本设立留日学监进行监督管理;当时专门吸收中国留学生的学校如弘文学院也按地域来编排班级,设有南京普通班、湖北普通班、四川速成师范班、北京警务班等;各省留学生均在日本创办了同乡会,成为本省留学生到达日本后所去的第一个公共场所;可以说,留学生们在日本的生活是国内生活的缩影^②。诸人于“眷怀宗国之外,而于桑梓尤注意焉”^③,民族意识与地域意识杂糅在一起。那么,在异国他邦的参照下,清末留学生们是如何认识“桑梓”与“宗国”的关系的?又是如何评判地域文化的?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探讨这些问题既有助于推进对近代地域文化观念演变的认识,也有助于进一步考量清末留学生群体在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史上的影响。鉴于现有研究成果对此尚无专文介绍,本文拟作些探讨。

一、爱国必自爱邦始,谋国先从谋邦始

所谓地域意识,是指对地域角色的认识,大体上包含两个层面的考量:一是立足地方与国家的关系,强调本地对国家全局的意义;二是立足地域与地域的关系,凸显本地的特色。两者常常交织在一起。晚清以来,随着湘军、淮军等地方军事力量的兴起,地方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地域观念盛行。庚子事变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辛丑条约》,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爱国人士纷纷探讨救亡之策。为应对内外局势,清政府实施“新政”,其中一大举措就是鼓励各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形成了清末留学日本的热潮。留日学生们一方面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地域意识,另一方面又赋予其新的内涵。他们无不揭橥地方之存亡对于国家全局之重要性、彰显地方的责任,期待本省本邦在保国存种的救亡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地域意识的背

后,隐含的是对救国道路的探讨。这种地域意识的形成,既受国内局势之影响,复与他们留学异邦的特殊经历有关。

正如湖北学生所言:留学生们身在异国,“受外界之刺激,而动其内部之感情,其脑质中无人不印有一中国在,且无人不思有所以效其力于中国者”^④,民族意识油然而生。在日本,他们“登三神山,饮长桥水,访三条、大隈之政策,考福泽、井上之学风,凭吊萨摩、长、肥,遍观甲午、庚子战胜我邦诸纪念”^⑤,既对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欣欣向荣的景象有了切身体会、产生了欣慕之情,也为“老大帝国者,竟不能一洗甲午、庚子诸纪念之辱”^⑥而羞愧。日本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中转站,也为留学生们广泛接触西方政教文明、反思本国政教文明提供了平台。所谓身外观身,稍窥症结,“读美著支那人气质之书,阅法刻支

^①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刘伟《晚清省意识的变化与社会变迁》(《史学月刊》1999年第5期),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析了省意识的形成以及后果;王续添《民国时期的地方心理观念论析》(《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探讨了民国社会的地域性特征及这一特征的三种观念表现形式——家乡观念、地界观念和同乡观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特点及其社会功能;程美宝《地域文化与国家认同:晚清以来“广东文化观”的形成》(三联书店2006年版),探讨了晚清至民国有关地域文化的叙述是如何形成的,揭示地域文化观背后的地域认同与国家意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章征科《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地方意识勃兴的原因与特点》(《史学月刊》2005年第1期),从总体上分析了20世纪初知识分子地方意识的表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及特点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成果聚焦于地域意识的种种表现及其成因,很少关注某个特殊群体的地域意识,也基本上没有涉及“参照系”的变化对地域意识的影响。

^②[日本]实藤惠秀著,谭汝谦、林启彦译《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23页。

^③《游学译编社同人公启》,《游学译编》第2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④《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⑤《致湖南士绅书》,《游学译编》第3册,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⑥《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那势力之图,譬如山鸡对镜,自见其形”^①,比起国内民众,留学生们亡国灭种的危机感更为强烈,进而积极谋求改变局势的途径和方法。

究竟该如何改变局势、效力中国?各省留学生均秉持谋国先谋邦、爱国先爱邦的理念,将爱国落实到了爱邦上。如湖北留学生提出“吾辈既为湖北人,则以湖北人谋湖北,亦自有说。”认为以湖北立言,“非敢自相畛域也,实智力之小,尚未足以谋远大也”,“故不得已而援由乡及国之义,暂以湖北一省为初点。”^②江苏留学生提出“人未有不爱其亲而能爱乡党邻里者,即未有不爱其乡党邻里而能爱国者。今人之竞言爱国矣,而吾言爱国必自爱乡始。无他。事之由小以成大,自迩而及远,亦必至之势,无可如何者也。”^③杨毓麟提出“吾湖南人也,欲谋中国,不得不谋湖南。”^④在“吾国”与“吾乡”的关系问题上,湖南留学生周家纯作出了很好的解释“故乡即吾国土地之一部分也,故乡之人即吾国之人之一部分也。吾欲为吾国筹,不能不先为吾故乡筹之。”^⑤在留学生的思想中,邦、国同构,地域意识与民族主义精神实现了融合。这是留日学生地域意识的一大特点。

在此背景下,各省留学生揭橥本省对于全国的重要意义。江苏留学生提出“江苏者,全中国之枢轴也,全世界之枢轴也。江苏之固有力不发,故我全中国之力无所始而发。江苏之志事不成,故我全中国凌夷衰微、暗淡茫昧。”^⑥直隶人说“我直隶人可谓四百兆同胞之干城之寄,我直隶人可谓五大洲异种人物之望。”^⑦湖北学生强调,如今中国是世界各国之竞争中心,而“以中国竞争之局卜之,吾楚尤为中心点之中心点”^⑧“湖北之在今日,固中国之中心点也”^⑨。浙江留学生说“浙江者,文明之中心点也。”^⑩云南人强调“夫云南保存,则中国保存,云南亡则西南数省随之亡,西南数省亡,则中国随之亡。”^⑪湖南留日学生更是强调“湖南乃十七省人心希望之所系”,发出“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吼声。诸人无不强调本省之危亡对于国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作用。这种思想既是晚清以来地域意识的发展,更是留学生在接触到近代民族主义之后对地域意识的升华。

彰显本省之于全国的关系至重,是为了强化本省的责任意识与担当精神。留学异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使各省留学生对本省在全国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所应发挥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晚清以来,湖南以率先掀起维新运动而闻名中国。其时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广东人梁启超评论道“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其学者有畏斋、船山之遗风,其任侠尚气与日本萨摩、长门藩士相仿佛,其乡先辈若魏默深、郭筠仙、曾劬刚诸先生,为中土言西学者所自出焉。”^⑫并认为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非湖南莫属。这种看法也为相当一部分湖南人所接受,成为他们的自我认同。湖南留学生在认识到萨摩等藩在日本明治维新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后,认为湖南的“萨摩之喻”名不符实。他们期待“我湖南一变,则我中国随之矣”^⑬,湖南能成为国家变革的主动力量,成为真正的萨摩。

在留学生们谋求救亡之策的过程中,还出现了更为激进的主张,即脱离清政府、实行地方自治。这种思想也极大地影响了留学生的地域意识。1902年,广东人欧榭甲在日本横滨出版《新

①②⑨《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③《江苏同乡会创纪事》,《江苏》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④杨毓麟《新湖南》,饶怀民编《杨毓麟集》,岳麓书社2001年版,第32页。

⑤周家纯《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游学译编》第4册,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⑥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江苏》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⑦未醒人《说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78页。

⑧《湖北学生界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⑩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光绪癸卯二月。

⑪崇实《论云南人之责任》,《云南》第3号,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⑫梁启超《南学会叙》,易鑫鼎编《梁启超选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63页。

⑬《致湖南士绅书》,《游学译编》第3册,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广东》(又名《广东人之广东》)一书,提倡广东人速谋自立之法,并主张广东人有自立特质,应当成为刷新中国政治的领头羊。一时间,关于各省人民之特质、谋求自立的利弊因素的讨论十分热闹,各省留学生无不主张本省在刷新中国政治中应当发挥重要的作用,这类言论尤以湖南留学生最为突出。湘籍留学生杨毓麟提出“湖南人之湖南”的概念“湖南者,吾湖南人之湖南也。铁血相见,不难不辣,此吾湖南人对于湖南之公责也,抑亦吾湖南人对于汉种之公责也。”^①他认为湖南人对湖南有责任,对汉种更有重大之责任。这是因为,在清季民族主义的视野下,曾经让湖南人引以为豪的湘军成为“杀同胞而媚胡种”的罪人。杨毓麟提出:湖南应当将功赎罪,争当脱离满族奴役、谋求民族自立的领头羊。他作《新湖南》就是要“遍告湖南中等社会,以耻旧湖南人之甘于为奴者,以谥旧湖南人之不愿为奴者,以待十八行省之同褫奴服,而还我主人翁之位置者。”^②要以湖南人的独立性,制造新湖南;以中国人之独立性,制造新中国。浙江留学生则宣传要建设新浙江,以作为救国的起点。

以世界各邦为参照来定位本省角色,是清季留日学生地域意识的又一大特点。湖南留学生言“以湖南比近世之帝国,一日耳曼二十五联邦中之德意志也。以湖南比世界之共和国,一美国十三州中之华盛顿也。”^③湖南地域意识归根结底是强调湖南在民族主义建国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放眼世界,“欧洲古国斯巴达,强者充兵弱者杀。雅典文柔不足称,希腊诸邦谁与敌?区区小国普鲁士,倏忽成为德意志。”这些在民族国家中起到核心作用的地域成为湖南留日学生的新偶像。有鉴于此,湖南少年喊出“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的口号,直抒“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情^④。这些言论不仅在留学生中间传颂甚广,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湖南本省的学子。1906年,蒋廷黼从邵阳乡下来到湖南长沙明德小学就读,发现年长的一些学生中间,特别是毛泽东就读的省立师范中,流行着“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的口号。“普鲁士主义的真意何在,没人能够真正了了。”

那句口号的意思只是表示在新中国建立的过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担任重要角色。极端的保守主义转变成极端的激进主义。”^⑤留日学生的地域意识通过口号式的宣传变成了本省人士的共识。

二、评估地域文化,为地方自治张本

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竞言谋国先谋邦、爱国先爱邦,将民族主义精神融入到地域意识之中。他们“各以省籍联会,斐然纂述,提倡本省风气,注意地方自治,以为争存保种之计”^⑥,以地方自治作为保种保国的起点。为此,他们对地域文化进行了独特的评估。

留学生们指出“欲争自由,先言自治。然必于其本土之人情历史地理风俗详悉无遗,而后下手之际乃游刃而有余。”^⑦不少省份的留学生成立了专门的调查部,以便把握本省历史地理人情风俗等情况。湖北留学生指出“湖北者,湖北学生演其输入文明之舞台也。湖北调查部者,测量此舞台而辨其所以利用之方针也。”^⑧江苏留学生同乡会也表示“本会设立调查部,所以考察本省情形,藉资研究,为他日地方自治张本。”^⑨《浙江潮》特设“新浙江与旧浙江”栏目,探讨浙江的历史、兵事、教育、特产经济、地理、社会之一般风俗、交通机关、统治机关、农工商业、外人于浙江之势力及其注意、浙江人之海外事业等情形。其他各省留学生也纷纷聚焦本省的历史地理等状况,形成了一股地域文化思潮。

①②杨毓麟《新湖南》,《杨毓麟集》,第32页。

③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论著”。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5页。

④杨度《湖南少年歌》,刘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页。

⑤蒋廷黼《蒋廷黼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32页。

⑥《寓江西陈君致浙江同乡会书》,《浙江潮》第3期,光绪癸卯四月二十日。

⑦《浙江潮发刊词》,《浙江潮》第1期,光绪癸卯二月二十日。

⑧《湖北调查部纪事叙例》,《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⑨《调查简启》,《江苏》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在这股地域文化热中,留学生们首先注意到的是本省的物产地理等硬件条件,发掘其独特的优势之所在。湖北留学生强调,“吾楚为九省总汇之通衢,江汉殷辏,商贾辐辏”^①,位置之善,为腹地所罕有。广东留学生强调,广东为天下所注目,因广东“有特质异于各省者数端,而其为中国精华之所注,则古所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华实之毛,则九州之上腴;防御之阻,则天地之奥区者也。”^②云南留学生指出:云南“据云岭之余脉,控金沙之长流,昆明六诏之遗墟,黔蜀两粤之保障”^③,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物产丰富,得天独厚。而浙江留学生指出“披我国之地图而观之,见夫背山面海、左江淮而右闽粤,中贯以钱江、甬江两河流者,非我浙江乎!其间人民三千数百万,地方七千数百里,物产数十万种,高原平原,大河细流,无所不有。动物植物矿物无所不备。江山诚耐人留恋哉。”^④江苏留学生指出:“吾江苏之在中国,又地方中以文明沃富称者也。历史人物甲于诸夏,租税所供表被九州,绵帛菽粟于是焉出,器用财贿于是焉仰,文学美术于是焉生,盖二千年以来,中国之文明未尝不以江苏之文明为代表焉。”^⑤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除表彰本省物华天宝之外,留学生们还往往追溯本省历史文化,探讨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凸显其人杰地灵的文化特色。如江苏留学生指出“江苏之在我中国,自上古强吴握霸权,以一隅雄天下,中世以降,英豪崛起,数为帝都。中原士大夫,每逢世丧乱,辄南渡星聚于此。殆二千年抵今,为中国文献之都汇也。是故江苏者,尽得吾中国之文明者也。”^⑥湖南留学生认为,湖南“系十七省人心之希望”,“以言建国,则有鬻熊、吴芮、马殷之霸业;以言开府,则有陶侃、张浚、瞿式耜、何腾蛟之忠勋;屈原以文章唤起国魂,船山以学说提倡民族,时务则魏源、郭嵩焘、曾纪泽为之先声,种界则曾静、贺金声、陈天华、姚洪业效其死命。”^⑦强调湖南具有光荣历史、开化民俗、大好人物和英伟事业。浙江留学生指出:浙江不仅林业、农业、工业、渔业等发达,而且学术文化极为发达,“乃读乡先哲学士大夫之遗书,其理想之高超,出乎天壤而入于人人,发为文章,云蒸霞蔚,光怪陆离,我浙江人于政治界文艺

界其位置固居何等乎。盖自中原文物输入我浙以来,风发云厉,电掣雷鸣,遂以成此日之形势。”^⑧由一方水土到一方人到一方文化,留学生们的地域意识最终归结到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对于留学生们而言,总结本省地域文化并非仅仅是表达爱乡之情,而是以近代西方文明为参照,重新衡量地域文化的价值,激活地域文化资源。在此背景下,一些地域文化被赋予了崭新的品格,成为地方自治、民族建国的助推剂,其形象焕然一新。湖南留日学生对湘学的阐释就是其中突出的例子。

湖南地处洞庭湖以南,群苗杂处,与中原交通不便,在学术文化上一直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自从清康熙年间湖南与湖北分治以来,湖南人先后通过一系列的文化工程,塑造出湖南与中原同沐圣教、一道同风的形象^⑨。晚清以来,从曾国藩等湘军将领到王先谦、叶德辉等湘籍学者,或塑造湖南“理学之邦”的形象,或打造湖南“汉学重镇”的形象,均体现出在文化上“去边缘化”的努力。而清季留日学生在新的参照系下,不仅不为这种边缘性自卑,反而视其为湘学优势之所在,对湘学作出了全新的评价。

其一,湖南政教学术“具有新机”,这是湖南成为推动中国变革的重要力量的保证。

蔡锷在比较中日变法得失成败的情形后指出:日本能变法成功在于它是一个“具有新机”

①张继熙《湖北学生界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②欧集甲《新广东》,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271页。

③《云南杂志发刊词》,《云南》第1号,光绪三十二年十月。

④⑧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二十日。

⑤《江苏同乡募捐公启》,《江苏》第2期,光绪二十九年五月。

⑥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江苏》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⑦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论著”。转自《辛亥革命》(二),第195页。

⑨参见拙文《文化立省:清代湖南的文化工程和地域文化形象的塑造》,《湖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

的国家,能够吸收中国、印度、西方政教文化之长,加上本国固有的精神,遂成精进不退之国家;而中国是天下之旧国,政教学术都出于自创,地大人众,不可强为。他还进一步分析“夫人老难与谋新,国老难与图变,而地小则事易举,势大则功难为,此天下之至情也。”英、法、俄、德等国“皆天下之新邦,政教、学术先取于人,而已乃扩张之也”;而埃及、印度、犹太、突厥、希腊、罗马等“皆天下之旧国,政教、学术创之于己,自足过甚,自信太深”^①,故步自封,久而衰败。

以世界各国的情形来比拟中国内部各省,则湖南属于“具有新机”的新邦。蔡锷认为“夫湖南僻在中国之南方,政教学术,大抵取索于中原,而非已有矣;则湖南者,亦犹罗马之英、法,可谓能有新机耳。”^②湖南政教学术不是自创的,不自负自大,更易吸收西方文明。这是湖南大有作为的保证。

其二,湖南具有独立根性、独立的学术传统,能够为建设独立的民族国家做出独特的贡献。

当时外国舆论认为汉族卑贱屈辱,善于服从,不足以居政府,而满人高视阔步,具有居上临下的气质,中国应当服从满清政府的统治。杨毓麟认为,这是对汉族的侮辱,作为湖南人,要建设新湖南以雪此恶讫。在他看来,全国具有自立特质硬件条件的省份很多,惟有湖南具备了自立所需要的软件条件即独立根性。

杨毓麟指出,湖南是山国,北阻洞庭湖,南隔岭峤,与外界交往不密,故“其民朴陋贫瘠,而暗于外事特甚,以排外闻天下”,但同时“奴性亦未甚深固”^③。当清兵入湖南、克长沙之时,湖南父老子弟厉兵秣马,跟随何腾蛟之后,“思保全疆土,以存中原文献于西南一角弹丸黑子之地”。何腾蛟失败后,湖南人又跟随堵允锡继续抗清;堵允锡既歿,又继之以李定国之役,一直至明祚既斩,死灰不燃;吴三桂盗用反清复明的名义发动叛乱,“犹足以倾我湖南人之观听”^④。杨毓麟指出,王夫之就是独立根性的标杆,其所著书“自经义、史论以至稗官小说,于种族之戚,家国之痛,呻吟呜咽,举笔不忘,如盲者之思视也,如痿者之思起也,如喑者之思言也,如饮食男女之欲一日不能离于其侧,朝愁暮思,梦寐以之。”^⑤

王夫之的种族之戚、家国之痛有过于黄宗羲,而其著作不传于王氏家人,不传于故旧亲戚,往往藏于古庙破刹之中,“故种界之悲剧流传于我湖南人之脑蒂者,最为酿深微至。”^⑥

杨毓麟还认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与湖南人科举中试者少、达于朝廷者少有关。元至清初,湖南与湖北合闱,湖南中试者寥寥,“盖洞庭以南,自为风气,而独以其庞民耆献之学说,展转相传播。”^⑦自雍正年间湖南、湖北分闱以后,湖南士子科举应试、达于朝廷者渐多,“利禄之途既启,而种性亦少劣焉”,然而犹在微芒之中保持了独立根性,比如,士庶之家,丧葬皆用前朝衣冠,名为“唐巾”,寓含着“生降死不降”的意义。可见湖南人未尝一日忘记奴戮之耻。

杨毓麟进一步指出,湖南人的独立根性使湘人在学术上能够空所依傍、自由创造,自振于他省之外。周敦颐“师心独往,以一人之意识,经纬成一学说,遂为两宋道学不祧之祖”;王夫之“以其坚贞刻苦之身,进退宋儒,自立宗主”;当阳明之说流播天下之时,“湘学独奋然自异焉”;当大江南北相率为繁琐经说之时,魏源“治今文《尚书》、三家诗,门庭敞然”;王闿运之于公羊学,“类能蹂躏数千载大儒之堂牖,而建立一帜”^⑧。湘学的独特性不仅在于它能不随流俗、空所依傍,还在于它往往能得先机,引领风尚。道咸之交,人们都耻谈洋务,而“魏默深首治之”。郭嵩焘远袭船山,近接魏氏,“其谈海外政艺时措之宜,能发人之所未见,冒不韪而勿惜”。至于谭嗣同,就更是“直接船山之精神”,“无所依傍,浩然独往,不知宇宙之圻垠,何论世法!”^⑨学术上的自立正是湖南人独立根性的表现,是谋求新湖南、进而谋求新中国的保障。

除湖南留学生外,其他各省留学生也都挖掘本省历史文化遗产中适应于天演、适应于生存竞争的因子。如浙江留学生梳理浙江文明发展史,表彰能与时代、与天然争胜的先贤,以激励后人。

①②蔡锷《致湖南士绅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6、17页。

③④⑤⑥⑦⑧⑨杨毓麟《新湖南》,《杨毓麟集》,第32、33、35、35、35、36、36页。

他们认为,有明一代,浙人“以王始,以黄终,彼皆能以人为力、利用其天然,故理想凌天气魄盖地,而鼎革之际,奔走海外者,犹踵相接”;而二千年前的项王“独能率其子弟为历史上一人物。怀哉怀哉,与时代争胜者其人固如是哉”^①。他们还指出“江浙人士自近古以来,久以文弱暴著于天下。而当明之季,以坚锐鸣者,多出南国衣冠,自江河以北,莫不望风喁喁,身先归附,虽以山东孔裔,率其子孙告庙大毁章甫逢掖之余,而文縞一疏,几遭没身之诛。即以一代春秋论之,北方之民气,远不若南人之盛矣。”^②通过这类总结活动,使在历史上尘封已久的历史人物、历史精神重现光彩,成为激励世人的典范。

三、改绘地域文化形象,争当民族建国的先锋

在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中,除了恭爱桑梓、引以为豪的认同感之外,还出现了反思与批判的声音。在西方政教文明的参照下,留学生们或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进化论为标准,或以尚武能群为标准,或以积极进取为标准,来检讨本省本邦地域文化品格与特征,指陈其种种弊端,直言本省地域文化若不改弦更张,本省将不得齿于诸夏之列。

受德国、俄国、日本等国政教文明的影响,清末中国留学生中盛行尚武思潮。而在尚武思想的观照下,江苏、浙江等传统文化发达的省份受到了本省留学生们的质疑。浙江留学生一方面认为浙江是“文明之中心点”,与全国兴亡关系甚大,“其亡也,则土地为人占焉,妻女为人奴焉,一切历史化为物语,一切盛业化为古迹;其兴也,则且将挟其一切哲理一切艺术、乘此滚滚汨汨飞沙走石二十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和,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以灌溉我二十一行省之同胞”,另一方面又警醒同胞浙江“文明则未成,而先流文弱”^③,即使是文明,也是雅典、印度那样的不能在当今蓝色地图上占据一席之地的文明,不能与天然争、与时代争的失败的文明。留学生们号召同胞不忘历史,继承前贤的精神志业,扩充浙江文化中能与天然争、与时代争的因素,一洗浙人“文弱”的恶名,在民族建国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中国传统文化版图中,江苏同样是“中国文明之制造场”,但在列强竞争的时代,留学生们发现,江苏也是“中国文明不适于天演之弊害之制造场”。他们指出,江苏“有三十万方里之土地,二千五百万伟秀之人民,僻处东海之滨,不入于中原四战之旋隅”;天下有事时,江苏“常以一隅制时变,而为中原士大夫避地之桃源”;“天下无事,常出其物产之富、技艺之精、政事文章之卓绝,以为中国文明之主动力”;在江苏境内,“邑有宋元时代之故家,野有汉唐时代之遗俗。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旷古为天之所骄子”。然而,“一旦鸿钧忽转,逢西力东渐之潮流,浩浩重洋,昔为背后之天堑,今作当门之逵路,莽莽海滨,昔为穷荒之弃地者,今作交涉之要区。”^④江苏又成为最受外力包围攻击者,而其民之驯顺、其地之殷丽、其外海交通之利便,适足以目挑心招、使外人入之而能安、便之而不能去。在江苏留学生看来,江苏就是中国的缩影、中国的典型,“如我支那人民以薄弱闻于世界,我江苏人民又以薄弱闻于支那”;“如我支那之土地以肥美闻于世界、世界咸得而鱼肉,我江苏之土地又以肥美闻支那、支那且咸得而鱼肉之”;“如我支那人之性质以虚闻、以浮闻、以无实力闻,我江苏人之于支那,亦以虚闻、以浮闻、以无实力闻”^⑤。留学生们甚至说,如果再以安乐地、文学渊薮来夸耀江苏,是“益咒骂我江苏”、“陷溺我江苏”。真爱支那、爱江苏者就应该认识到,支那无所有、所有者惟腐败;江苏无所有、所有者惟腐败。

江苏留学生们还将本省与他省对比,揭示自身的短处,指出:江苏“学问之不讲,游嬉之无节”比他省更为严重,“是故蒙霜露犯波涛,殖产海外,足迹遍于五洲,以与日耳曼种族争一夕之余利者,吾不如闽粤。沉毅强固,勇于任事,富于团结力,蹈白刃经险阻而不悔者,吾不如湖湘。

①③公猛《浙江文明之概观》,《浙江潮》第1期,光绪癸卯二月二十日。

②文谔《浙声》,《浙江潮》第2期,光绪癸卯三月二十日。

④铁生《江苏改革之方针》,《江苏》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四月。

⑤《江苏发刊词》,《江苏》第1期。

理想高尚 精神活泼 风发云涌 善于乘时势开未来者 吾不如浙江。夫以山川清嘉 历史荣誉之江苏 他日将不得齿于诸夏之列、肩随于浙闽湘粤之后。太湖之波 扬子江之潮流 其不能以雪此耻矣。”^①因此要改弘更张、去陈谋新 真正成为近代意义上的文明中心。

与浙江、江苏等中国文明中心省份相比 湖南因向来“僻在边缘”、风气自创而受到了本省留学生的肯定 甚至誉之为“十七省人心之所系”。但另一方面 湖南留学生也对本省地域文化多有针砭 特别是将湖南与他省对比 反观本省之不足。他们或以全体留学生的名义、或以个别留学生的名义 多次致信家乡父老 指陈亡国灭种之痛、湖南应负的责任 以及湖南在学术上的落后 敦劝父老多派留学生汲取学问、谋求自立。湖南留学生指出 当今泰西之学大多东移于日本 游学日本是培养人材的最佳途径。江苏、浙江、广东诸省“父遣其子 兄勉其弟 航东负笈 络绎不绝 群然以种祸相激切”^② 而“吾湘学生”“几如日出之星、秋后之果 屈指犹不过数十人”^③ 省内同胞一说游学 甚至传出许多笑话。可见湖南未能洞达时机。留学生们倡言“人无种性无常识 则无灵魂 无灵魂则愚 愚则奴之不知灭之不知。”^④以为湖南学界若不图新进 “五十年以内 我湖南灭种在于苏浙粤东之先 可以必矣”；“我湖南以主守旧主义、鄙弃西学 负罪天下 为十八省分奴隶界之代表者” 如果不图谋改变 则将来全国十七省脱奴隶籍时 将不齿与湖南同列等^⑤。要求父老乡亲多派人游学海外、激发其独立精神 负起求学救国之责任。

综观清末各省留日学生的言论 对地域文化的揄扬与批判并存 构成了地域意识中的二重奏 但两者之间倚轻倚重有所变化。大体上 至 1906 年左右 随着留学生中出现了更加激进的革命排满思潮 对地域文化反思与批判的色彩更浓、言辞更为激烈。以湖南留学生为例 1903 年 蔡锷倡言湖南政教学术具有“新机” 杨毓麟鼓吹湖南具有独立根性 杨度喊出了“中国将为德意志 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口号；而至 1906 年 同样作为湖南留学生的铁郎则发出了“湖南之在今日 将

将为天下第二印度、犹太也”的警告。铁郎极言湖南有“媚满性之圆足”、“合群性之缺乏”、“保皇性之愚谬”、“守旧性之固结”、“排外性之误看”等五性 对湖南地域文化诸多针砭 并为改造湖南文化形象提出了“速行悔过法”、“首倡起义法”、“力讲外交法”、“公约自治法”、“预备革命法”等五法 以为“五性者 亡湖南之病根也；五法者 医湖南之药石也” “存此病根之五性 则湖南为犹太为印度 行此药石之五法 则湖南为日本为法兰西。”^⑥与此前蔡锷、杨毓麟、杨度等人的观点相比 铁郎对湖南地域文化的评价批判色彩更深。这恰恰是因为他从革命排满的政治需要出发重新考量地域文化的优劣短长。

无独有偶。1906 年 云南留学生创立《云南》杂志以寻求“救亡之策” 也缕述云南存在众多“可危”之事 如民气素弱、人心涣散、智识不开、风气窒塞、鄙视武备、滇农懒惰不尽人力、没有工业、不能分担国事、人种弱等等 指出云南人应担负起“扫除积弊 造新规模、新气象”之责任 养成国民之资格 要倡公私立学校、倡勇武习武之事、激发士人之责任心 要“父戒其子 兄勉其弟 以增进精神之文明”等^⑦。不过 相对于铁郎等人革命排满的激进思想 云南留学生尚处于强调“云南为云南人之云南”、“救桑梓以保种族”的阶段。其反思云南地域文化之不足 是以是否有利于自治救国为标准来展开的。

正如留学生们揄扬域文化并非仅仅为了表达爱乡之情 而是参照西方近代文明、挖掘其中有利于救亡、有利于自治的积极因素一样 留学生们自揭其丑也并非不爱桑梓 而是从反面激励本省人士去陈谋新 摒弃地域文化中不适应生存竞争、不适应自治、不适应革命排满的成份 按照

①《江苏同乡会募捐公启》，《江苏》第 1 期。

②④⑤《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 6 册，“通信”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五日。

③周家纯《致湖南青年劝游学外洋书》，《游学译编》第 4 册 四册 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

⑥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 1 期“论著”。转引自《辛亥革命》（二）第 208 页。

⑦崇实《论云南人之责任》，《云南》第 3 号 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

时代的需要塑造出新的地域文化形象,以免在救亡运动中落后于他省。

留学生们不仅呼唤新的地域文化,而且通过创办杂志、传播新学新知、提倡自治等实际活动,对症下药,改塑地域文化的形象。湖南留学生们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输入文明、增益民智”^①,促进本省同胞的开新;又开设湖南编译社,大量向国内译介新书,几年之间,使“湖南之风气,湖南之学术,赓赓乎名誉冠各省焉”^②。《湖北学生界》以养成邦人“人人有国民之资格、能自立于生存竞争之世”^③为宗旨。浙江留学生“挟最新之思想,凭最新之学理”,“与乡人诸君策内地之治安”^④,鼓吹自治、鼓吹排满,一改浙江“文弱”的形象。云南留学生针对云南“可危之事”,致力于向同胞传播国家思想、团结思想、公益思想、进取思想、冒险思想、尚武思想、实业思想、地方自治思想、男女平等思想等。在他们看来,这些思想均是“欧美文明之大启、国势之勃兴”的根源,也是改变云南旧规模的良药。江苏留学生极言江苏惟有腐败,而《江苏》提供的是去腐之方,传输“尚武”理念。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改绘了地域文化的形象。

综上所述,留学他邦所造成的空间区隔和参照系的变化,不仅激发了留学生们的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精神,也使他们的地域意识发生了变化。对清季留日学生而言,“中国人”的国族认同与湖南人、浙江人、江苏人、湖北人、直隶人等具体地域身份认同重叠在一起,在爱国先爱邦、谋国先谋邦的理念指导下,他们将爱国诉求落实到“谋邦”上,从而使地域意识与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其具体内涵就是期待本省成为刷新中国政治、建立民族国家的领头羊。作为“谋邦”的首要前提,各省留学生纷纷总结本省地域文化遗产,并以西方近代文明为标准,重新评估本省地域文化的价值。这使清末留学生的地域文化观呈现出认同与批判并存的特点。一方面,他们试图挖掘地域文化的新价值,将地域文化精神与近代民族精神对接,赋予地域文化以崭新品格;另一方面,又针砭、批判地域文化中不太符合近代社会竞争需要的因子,并试图改绘地域文化形象。通过这些活动,使地域文化最终成为服务于

地方自治、民族建国需要的思想资源。从这个角度看,清末留日学生的地域文化观不是对地域的简单认同,而是时代精神的折射。

必须指出的是,尽管认同与批判并存是清末留日学生地域文化观的特点,但在认同与批判的具体内涵上,也即认同什么、批判什么上,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一方面,诸人对西方政教文明的理解有异、取舍不同,导致所选择的参照物不一;另一方面,政治诉求的不同也会影响对看待地域文化的眼光。此外,留学生们地域意识有强弱的变化过程,1902—1906既是自治思潮十分盛行的时段,也是留学生们地域意识最为高涨的时段^⑤。此后,随着“非省界”呼声的兴起,地域意识逐渐让位于民族意识;而留学生中间革命与立宪的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对地域文化的关注。限于篇幅,这些问题另拟专文探讨,此处只能略而不论。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近代‘湘学观’的形成与嬗变研究”(11YJA77006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朱发建(1964—),男,湖南慈利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张晶萍(1967—),女,江西鄱阳人,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方英

①《游学译编社同人公启》,《游学译编》第2册,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

②铁郎《二十世纪之湖南》,《洞庭波》第1期“论著”。转引自《辛亥革命》(二)第208页。

③《叙论》,《湖北学生界》第1期,光绪癸卯正月。

④攻法子《敬告我乡人》,《浙江潮》第1期,光绪二十九年二月。

⑤这从留学生们所办杂志即可窥其一斑。1902年至1906年左右,留学生先后办有《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直声》、《云南》、《洞庭波》等,主办者既为各省留学生同乡会,刊名复有浓郁的地域色彩,所关注、所讨论的问题大都与地域有关。1906年以后,除1907年创办的《四川》杂志鼓吹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铁路主权以外,基本上没有以各省留学生同乡会为主办者、以本省命名的留学生杂志了。